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四卷 第一期
2012年6月 页107-110

书评

Marjorie Topley, *Cantonese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Gender, Religion, Medicine and Money*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ean DeBernard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1, xi+609pp.

李培德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本书《香港和新加坡的广东人社会：性别、宗教、医药和金钱》原为英语，题为 *Cantonese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Gender, Religion, Medicine and Money*，由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人类学教授白瑾 (Jean DeBernardi) 编辑与介绍。本书收录社会人类学家托普利 (Marjorie Topley) 于1950至70年代期间，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广东人社会为主题而撰写的20篇论文，洋洋600多页，堪称巨著，是同类型主题中不可多得的代表性著作。

本书虽然是论文集，且成文时间距今已有35年至60年之久，但编者在辑录本书的过程中下了不少工夫，例如对作者本人进行口述史访谈，在澄清一些事实之余，也为本书收集并加插了大量作者于田野调查时所拍的照片，增补或扩大一些尚未完成的章节，为作者介绍生平和学术贡献，编列作者已刊和未刊的著作目录，统一全书的不同汉语拼音和为全书加上索引等。

正如编者在导言所说，本书作者自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取得博士学位以来，一直没有在任何大学占一教席，但作者在学术上的地位与她在什么机构工作和占什么职位无关，她对学术的贡献已广被国际学术界所承认。

本书结构并不复杂，全书分五个部分，每个部分收论文数篇，编者尽量以论文的完成时序来排列，分别为（括号为发表年份）：



第一部分 新加坡的华人礼仪

1. 新加坡广东人举行的节日仪式 (1951)
2. 中国人的安魂仪式: 以广东人的习俗为参考 (1952)
3. 华人祭祀中使用的纸符、纸钱和纸笺 (1953)
4. 新加坡华人的冥婚 (1955)
5. 新加坡华人的冥婚补正 (1956)

第二部分 新加坡和中国的宗教组织

6. 新加坡华人妇女的斋堂 (1954)
7. 新加坡的华人宗教和宗教组织 (1956)
8. 新加坡华人宗教团体的出现及其社会功能 (1961)
9. 先天大道: 一个华人秘密宗教团体 (1963)
10. 19世纪的华人宗教和农村社会的凝聚 (1968)

第三部分 香港和广东的经济和社会

11. 储蓄和财富在香港华人社会扮演的角色 (1963)
12. 香港新界本土大米农夫和新移居的蔬菜种植者对资本、储蓄和信用的看法 (1964)

第四部分 香港和广东的宗教和社会

13. 一些“社会”的基本概念及其传统关系 (1967)
14. 香港的华人节日 (1967)
15. 有关香港先天道斋堂的研究笔记 (与许舒合著) (1968)
16. 广东农村中的抗婚 (1978)

第五部分 香港的中医和西医

17. 华人对疾病的传统思想和治疗方法: 香港的两个个案 (1970)
18. 天地的对立: 一个母与子的综合症 (1974)
19. 香港的中医和西医: 造成变体、互动和改变的一些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 (1975)
20. 香港华人的传统病原和治疗方法 (1976)

坦白说, 笔者没有受过人类学的训练, 很难对本书的所有章节逐一评论, 况且本书收录的论文已发表多时, 在学术界已有一定的评价, 无必要在现有的评价上再重新评论。对于本书的四个副题, 即性别、宗教、医药和金钱, 笔者无意争论其能否用以概括整个广东人社会, 但用来代表托普利的几个研究方向则甚为恰当。在书本辑录的众多论文中, 以讨论储蓄、财富、资本、信用的两篇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有时, 广东人的思想只能用“宗教性”来解释。例如广东人为何喜欢数字

“三”和“八”而讨厌“四”，这可否算是宗教仪式的一种？像这样的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回答，更容易令人接受。¹

有一点笔者极之赞同的，同时也是本书编者所强调的，即本书出版的最大意义在于追溯现代“香港研究”或“新加坡研究”的“原型”。今天的香港研究或新加坡研究，早已成为一门多元和综合性学科，而人类学、社会学在移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方面，可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² 本书托普利对新加坡或香港的研究，都是从二次大战后开始的，她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和目标，使用什么方法以在本土和外来之间取得平衡，对今天的研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去留意。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香港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经验中，如何树立起榜样，以作为今天中国大陆的借镜参考，相信会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托普利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是该校人类系的首名毕业生，与她拥有相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可谓大不乏人，包括弗利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英德（Barbara Ward）、裴达礼（Hugh Baker），³ 他们都是在二次大战后冷战的背景下，在无法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实地研究的前题下来到亚洲。⁴ 无可否认，他们所追求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原型不在于新加坡或香港，而在于中国大陆本土。不过，从本书的研究显示，对托普利来说，新加坡或香港同属英治殖民地，是华人社会的另类，同样具吸引力。不过，据笔者的观察，在强调中国传统的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社会，到底如何在西方影响的洗礼下产生改变？新港两地间又是否可以互相比较？收录在本书的托普利的论文中，似乎都没有讨论。有关这一点，可能会让对此有所关心的读者失望。

回应前文所提及的，托普利的学术地位并非从她所代表的学术机构来衡量，她的论文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刊载在国际知名学报。毫无疑问，她是一位国际性的学者，并且在她的研究经历中，有过不少国际间之合作。据笔者翻查资料所得，托普利在香港曾经组织“伦敦—康乃尔计划”（London—Cornell

¹ 参见Chien Chiao (乔健), “Cognitive Play: Some Minor Rituals among Hong Kong Cantonese,”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2 (1983): 138–144。

² 根据托普利本人所说，在二次大战前没有人类学家在香港进行过研究或田野调查，见Majorie Topley, “Anthropology and Fieldwork in Hong Kong,” in Majorie Topley (comp.),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in Hong Kong: Field Projects and Problems of Overseas Scholars: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February 8–9, 1969*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9), pp. 1–21。

³ 这些学者的名字经常出现于香港新界的研究著作中，见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页9–30、31–40。不过，托普利除外。显然，在从事香港新界研究或华南研究的学者的眼中，托普利的地位不如弗利德曼和华英德。

⁴ 李灏〈人类学家话沧桑：《超越繁器：香港传统村落》读后〉，《星岛日报》（香港），1996年4月6日，页D2。

Project),⁵ 但可惜没有交代详情。⁶ 到底, 英美学者之间, 对于香港华人社会这一共同研究对象, 是否存有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 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最后, 本书收录托普利的20篇论文, 到底是如何筛选的? 本书编者如能加以注明, 则将更容易令人明白。笔者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网上目录 (<http://www.lib.hku.hk>) 找到以下三篇由托普利撰写的论文, 但未被收入本书的著作目录 (见本书页 22-24), 供读者参考:

1. “Anthropology and Fieldwork in Hong Kong” (香港的人类学研究和田野调查), Majorie Topley (comp.),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in Hong Kong: Field Projects and Problems of Overseas Scholars: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February 8-9, 1969*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9), pp. 1-21.
2. “Social Changes in Hong Kong” (香港的社会转变),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ed.), *Responsible Parenthood and Family Life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Hong Kong, 28th September - 1st October 1971* (Tokyo: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Western Pacific Region, 1972), pp. 16-21.
3. “Internal Balance and External Harmony: Chinese Metaphysics and Some Problems of Health and Behaviour in Children” (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和谐: 华人的玄学与一些有关儿童健康和行为的问题), 41p. (unpublished paper, no date).

⁵ 代表学者应为施坚雅 (William Skinner) 和詹逊夫妇 (Graham Johnson, Elizabeth Johnson)。

⁶ Majorie Topley, “Anthropology and Fieldwork in Hong Kong,” pp. 1-21.